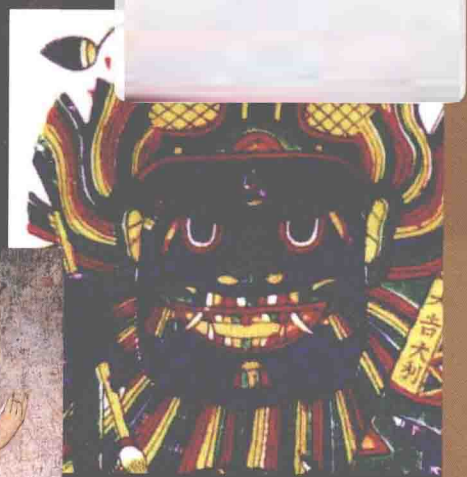




从“画魂”归来说起

CONG HUAHUN GUILAI SHUOQI

周昭坎/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从“画魂”归来说起

CONG HUAHUN GUILAI SHUOQI

周昭坎/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画魂归来说起 / 周昭坎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10-5811-0

I. ①从… II. ①周… III. ①美术史 - 中国 - 文集
IV. ①J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9086号

从“画魂”归来说起

CONG HUAHUN/GUI LAI SHUO QI

周昭坎 著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宋 旻

责任校对 陈 玲

装帧设计 晴 舟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四川西南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0mm × 190mm

印 张 10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5811-0

定 价 55.00元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文如其人

——序《从“画魂”归来说起》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 邵大箴

周昭坎君是一位画家、美术活动家，也是一位理论家。数十年来，他撰写了不少美术评论文章，因为这些文章与他从事的艺术活动有密切关系，写的是他对周围艺术现象的分析、欣赏当代艺术大家作品的心得体会和对当代中国美术问题的认识与分析，文章言之有物，感情真挚，语言质朴，读来使人感到亲切。

周昭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美术家，他受过系统的革命教育，接受了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训练，也经历了“文革”的磨炼，更沐浴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春风。他走过的道路和亲历的各种事件，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密切的联系；他关心的问题，他的思维方法和艺术视角，刻有中国社会这段历史的烙印，也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切感受，即他在当时境遇中的喜怒哀乐。惟其如此，他的文章，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勾引起我们对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美术界许多人和事的回忆，使我们产生感情的共鸣，也使我们再次体会到：中国社会和中国美术得助于改革开放之力，才有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而且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才可能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改革开放意味着变革和创新，而怎样理解变革和创新，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如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核心问题。在美术领域，鼓励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艺术创新，包括借鉴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探索与尝试，都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对民族传统艺术20世纪以来新兴美术的否定。20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产生了重要作用的现实主义美术，其核心内容——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和为大众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仍然有继承和发扬的价值。对新旧政治环境和不同艺术“气候”有对比经验的周昭坎，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从而确立了他坚定的信念。他与激进主义思潮和保守思想保持距离，坚持中庸的艺术立场，即尊重传统艺术和鼓励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创新。数十年来，他在美术界的作为，包括他撰写的美术评论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艺术思考。也可以这样说，在这些文章中，活脱地呈现出周昭坎其人的形象，这正如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

在周昭坎君的文集《从“画魂”归来说起》即将付梓之际，以此小文为序，谨表示祝贺之意。



邵大箴（1934—）

目录

- 001 从“画魂”归来说起……
- 012 “画魂”归来的前前后后
——关于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是与非
- 025 油画艺术的春天
——85’黄山油画艺术研讨会的回忆
- 036 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去从
——在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论坛的发言
- 044 从黄宾虹晚年变法看中国画教学
- 049 关于油画的辩证
——兼论创作自由
- 053 失去方知不可或缺
- 055 “艺术良心”的思索
- 057 从审美意识看浙江
- 060 完白书法贵在美的创造
- 064 无尽的精神感召
——“王式廓百年纪念展”观后
- 068 师造化 夺天工 为人生
——与吴作人先生问答绘画艺术
- 074 旧画重提
——得宠的老“月份牌”年画
- 088 简直是东方的“文艺复兴”
——古今中外说年画
- 132 我心中的赖少其
- 138 艺术的强者 强者的艺术
——侯一民先生及其为人为艺
- 145 《美术》杂志的一段往事
- 148 一个难忘的工作团队
——忆在《美术》杂志工作的日子
- 152 九龙山畅想
——在“首届九龙山艺术展”筹备会上的发言
- 156 后记

从“画魂”归来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上盛传一段“‘画魂’归来兮”的佳话。这缘起于一位安庆女作家写的传记小说《画魂》真的招来小说主人公——皖籍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遗作从巴黎回归合肥。一时潘玉良遗作展在合肥、上海等地展出，轰动一时。紧接着，由著名影星巩俐扮演潘玉良拍成的电影《画魂》隆重上映，电视连续剧《画魂》的收视率也居高不下。经过商家一阵热炒，本来在拍卖市场不见踪影的潘玉良作品，一下子成了短线投机的“收藏家”炙手可热的抢手货。至2005年，潘玉良的一幅《1949年自画像》的成交价被炒到10,218,400元人民币，而在国内上拍的、为数不多的63件潘玉良作品中，也有十分之一超过了百万元人民币，价位徘徊在六位和七位数之间，尽管其中不乏足以乱真的高仿膺品，仍然有人趋之若鹜。

1978年，当40岁的石纯男从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调到安庆市图书馆当古籍管理员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四年后，她凭着爱好文学写作的热情，居然从图书馆里一份淹没半个世纪的资料《潘张玉良夫人画展特刊》里，寻访到久居安庆的潘玉良儿媳彭德秀（安庆市石灰厂退休营业员）。她先写出了一篇五千字的小传《安徽旅法女画家潘张玉良》，1982年发表在安徽出版的一份杂志《艺谭》第二期上，接着又在这个基础上凭借艺术虚构扩展为



潘玉良(1895-1977年)

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张玉良传》。

1982年，安徽作协的文学杂志《清明》，在第四期上刊出了石纯男以笔名“石楠”发表的传记小说《张玉良传》。小说讲述了一位旅法女画家从“孤儿——妓女——小妾——艺术的追求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出名的艺术家”的传奇故事，吸引了读者的兴趣，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激发了正沿着改革开放之路奋发图强的中华儿女的心灵共鸣，激励着人们释放个性，掌握命运，自强不息，为国争光。小说一发表就引起刚从“文革”复苏的文学界的重视，《文汇报》《新观察》等十余家报刊相继连载、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以《画魂》为书名出版小说发行，轰动一时。事情就那么巧，《画魂》正当热时，潘玉良在法国的数千余件油画、水墨画、雕塑等遗作于1984年春突然从国外运回祖国，于是，“画魂”归来的佳话一时席卷海内外的华人圈，“潘玉良热”也随之升温，从文学界发展到影视界、商界。

其实，在石楠1985年发表于《新民晚报》那篇《从〈张玉良传〉到她的画展》的文章里，她就坦言：“三年前，我以一个初生之犊的勇气，试图为一个漂泊异域的女画家立传。可我对她知之甚少。只是从她家属那里借得一纸《潘张玉良画展特刊》的复印资料，数张雕塑作品和生活照片。我搜阅了建国后所有报刊，没有发现有关张玉良的只言片语。我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凭着对一个从旧社会底层奋斗成为一个著名画家的人的爱和崇敬，蘸着自己的泪水去讴歌她。”因此，小说许多情节实际上是虚构和夸张的，正是因为当时她初涉写作，对传记文学的严肃性和游戏规则把握得不是那么严谨，所以在小说发表后，曾经一度引起美术界元老和曾经是她同事、学生的愤懑，认为石楠在小说里对潘玉良艺术和生活经历的虚构以及艺术成就的夸张拔高“极不严肃”，“会被人家误解为中国艺坛无人，只好吹捧潘玉良，这样引起的效果是很坏的。”有的说：如果外国艺术家误认为潘玉良的作品就是中国画家的最高水平，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这些不满甚至写进1983年4月19日的“内参”文件《文艺思想动态》，送到了中央高层领导面前。“内参”的内容传到潘玉良的儿媳彭德秀的耳中后，她也于5月8日致信文化部、中宣部，称作者在采访她成书后并未将书稿内容征求她的意见，故意在作品中使用潘玉良的本姓“张”，以混淆真实与虚构，并引用大量潘玉良信件内容，要求作者、出版社为潘玉良“正名”，删除虚构的、不利于潘玉良名誉的内容。



小说《画魂》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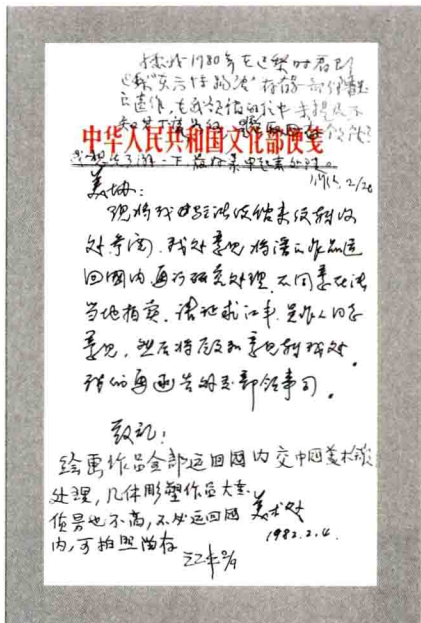
电影、电视剧《画魂》海报

对于《画魂》这本小说，作为真人传记的是是非非，我在拙文《“画魂”归来二十年》（《美术博览》2004年总11期）和对中央电视台及一些报刊记者诸如《画家潘玉良是怎样被捧红的》《是谁捧红了潘玉良？》的提问中，已经作过不少说明，认为《画魂》的写作作为“传记”确实不够严谨，好在与后来的影视作品为了突出潘玉良的青楼传奇和风花雪月那些事的胡造乱编相比，小说至少还是大致符合潘玉良的真实经历，尚且算得上是“合理的推理与艺术的虚构”，作为个性解放，与命运抗争，自强不息的女性，潘玉良还是值得人们同情与尊敬的。和潘玉良相熟的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说得很明白：“潘玉良是很好的人，但是画卖不掉……客观地讲，潘玉良的画不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与潘玉良同时代的旅法画家）比，差很多。……她人非常豪爽，画稍为俗一点。”她的艺术成就自有她应得的地位而为美术界认可，任何夸大都只会造成对她的伤害，相信明白人自有公正的评价。正如石楠自己所说：“我当初若有了后来那番经历，是万万不敢选择这样一个难题来下笔的。”

二

不过，在诸多以讹传讹之中，以小说《画魂》导致潘玉良遗作的归来才是天大的误会。在此前后，石楠发表于“潘玉良遗作展”展出期间的文章——《从〈张玉良传〉到她的画展》，和一些评论家文章的发表，也在不言中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就是因为《画魂》走红形成的舆论压力，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这才设法把潘玉良的遗作从法国弄回中国。更有甚者，一位自称“作家”的人还当着我的面大吹如何把石楠推荐给《清明》杂志，又在《画魂》走红后拿着小说如何找省委领导谁谁谁，通过文化部、外交部谁谁谁的关系，和法国方面怎么交涉，终于把潘玉良的遗作运回了祖国，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听了又好笑又好气，但又不使用事实戳穿，因为我们这些参与其事的人，都记得当时不知哪位领导传下来的话：为了避免外交纠纷，潘玉良的画怎么弄回来的经过至少20年不要外传。所以，我只好无奈地反问一句：“是真的吗？”，一笑了之。

好在现在已经事过二十多年，我们这些亲历者也都已七老八十，经手过此事的前中国美术家协会两任主席江丰、吴作人，美协外联部主任江有生，前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前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华君武，到法国亲手清点作品的画家郁风和热心此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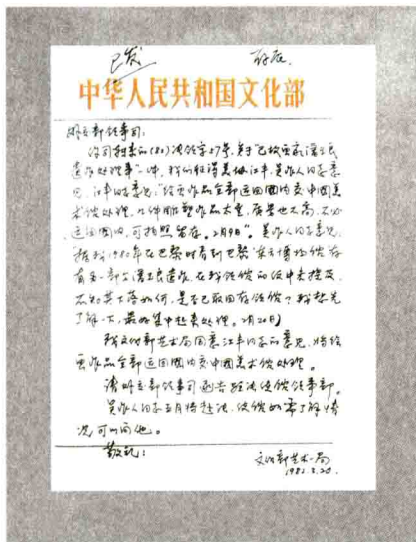


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致中国美协函

旅法华人画家吕霞光等都已先后作古，始终关心和具体操办此事的前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代处长、漫画家王米也在离休后去澳大利亚探望女儿时客死异域……因此，应该是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的时候了。

事实是，早在“文革”前，潘玉良就有把作品运回祖国的打算，为此，她的丈夫潘赞化生前曾经给安庆市政府写过报告。1965年，她又希望长孙潘忠丘（安庆市第一工具厂工人）来巴黎帮助她清理作品，由于那时出入境管理很严，她还求助过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刘曾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工作，并两次到巴黎会见当地华侨），让安庆市政府协助办理潘忠丘的出境手续，但没有结果。潘玉良去世前又郑重托付其晚年同居的知己王守义先生，一定要设法把她的作品运回中国。与此同时，潘玉良家属在得知潘玉良去世的消息后，其子潘牟（安庆市第四中学英语教师，1979年12月9日去世）于1977年8月28日致函外交部西欧司，函的内容大致为：1.要求协助将潘玉良骨灰运回国安葬。2.遗作运回国，运回后大部分遗作捐给国家，小部分留给家庭作纪念。3.将法国各美术馆、博物馆内收藏的潘玉良作品拍成照片，以备家庭出“潘玉良纪念册”。4.如果有其他的遗物、遗产，运回后由潘牟继承。小孙子潘忠玉（安庆市燎原化工厂工人）也于1977年10月1日代表家属给外交部领事司写信，陈述潘玉良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成就，希望国家协助处理潘玉良的遗作，表示潘玉良的遗作是国家的财富，家属“除留极少数作为纪念外，全部献给国家，由国家处理”。接着，王守义于1978年秋回国探亲，在北京逗留时拜望当年留学法国的老友邓颖超（王1919年留法时与聂荣臻同班，与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相熟），提出了他回国定居和将潘玉良遗作运回祖国之事，得到了邓的赞许和支持，承诺届时给予必要的方便和在北京定居的住房安排等。王守义到南京时，约见了潘玉良的亲属彭德秀等会面，商量的遗产处理问题。考虑到作品运回的诸多困难，准备回法国后一方面为潘玉良筹备一个遗作展览，出售一部分作品换些钱作为运作的费用，另一方面为潘忠玉办个去法国求学和作为遗产继承人的手续，再设法把作品运出来。

可惜的是，王守义回到巴黎不久，左耳后根得了恶性肿瘤，住院治疗竟卧床不起并日见恶化。病危之际，在法国没有亲人的他约见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戚德恩，恳切地交了他的后事处理意见及潘玉良委托他把遗作运回祖国的未了心愿，把潘玉良住所的钥匙交给了戚德恩，委托他保管潘玉良的遗作、遗物



文化部艺术局致外交部领事司函

并争取实现潘玉良的遗愿。由于潘玉良的住所是她之前的寓所拆迁时政府临时安排的住处，她去世后有关部门一直催促搬迁，并且已经有人进去拿走过一些东西，所以，戚德恩拿到钥匙后，立即把潘玉良的所有遗作和遗物捆扎装箱，运到大使馆地下室和车库保存。1981年5月5日王守义去世后，使馆首先把方便邮寄的六箱衣物和154张照片、200余封书信及现金寄交安庆潘牟之妻彭德秀，而对如何处理潘玉良的画作就成了使馆头疼的问题。因为，法国对艺术品的管制很严，不仅携带出境很难，而且即使要在本地出卖，也必须要有合法的继承人或持有者出面。使馆不便出面，曾找潘玉良生前好友、旅法画家吕霞光等商量，吕也只答应可以设法找个人出面作为收藏人来持有这些作品并出面拍卖或出售，但必须给这个人支付不菲的佣金，不然是没人愿意冒此风险的。

三

为了确认潘玉良的作品是否值得运回中国，使馆在1980年10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作人出访南美途经巴黎、1981年3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赴法参加“中国木刻50年展览”开幕式在巴黎逗留期间，分别请他们到使馆看看潘的作品。江丰表态：“有研究价值。”

于是，使馆于1982年1月18日起草《已故画家潘玉良遗作处理事》的报告，以（82）法领字57号文件发至外交部领事司并文化部艺术局，文件指出：“这些画存放我馆，多有不便”，“最好是尽快处理”，并提出两个处理方案：“一、全部运回国内交有关艺术部门”，“如国内同意的话，我们将设法运回。”二、根据家属提出的方案“挑选部分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运回国内，其余作品在当地拍卖，所得之款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给家属”，而“在法拍卖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并把与吕霞光等人商量的情况转述报告。

文化部在收到上述文件后，由艺术一局美术处于1982年2月4日批转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我处意见将潘的作品运回国内再行研究处理，不同意在法当地拍卖。请征求江丰、吴作人同志意见。”江丰2月9日批复：“绘画作品全部运回国内交中国美术馆处理，几件雕塑作品太重，质量也不高，不必运回国内，可拍照留存。”吴作人2月20日批复：“据我1980年在巴黎时看到巴黎‘东方博物馆’存有另一部分潘玉良遗作，在我使馆的信中未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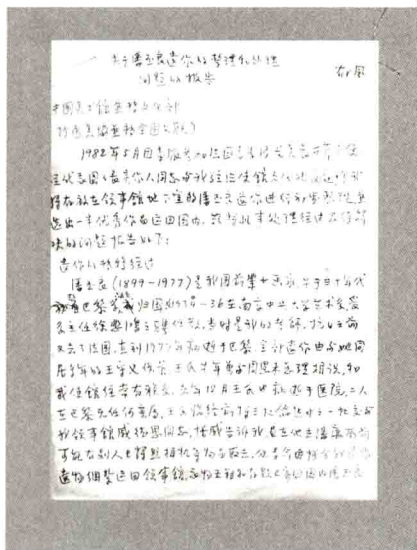
及，不知下落如何，是否已取回存使馆？我想先了解一下，最好集中起来处理。”文化部把意见又转给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批复：“潘玉良画，我馆可以选藏一部分，她的全部遗作遗物如何处理，费用由何单位出，怎样运回国等事，请文化部考虑决定。”

这样，文化部艺术一局就于3月20日复函外交部领事司，在转达江丰、吴作人意见后表示：“我文化部艺术局同意江丰同志意见，将绘画作品全部运回国内交中国美术馆处理。”另告：“吴作人同志五月将赴法，使馆如需了解情况可以问他。”外交部领事司于4月以（82）领字207号文件向驻法大使馆转告了文化部、美协关于处理潘玉良遗作的意见。

1982年5月，吴作人、郁风奉派赴巴黎参加“法国春季沙龙美展”开幕式，并于事后按文化部嘱咐与我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处商榷潘玉良遗作处理事宜。他们在使馆车库和地下室发现，潘玉良的遗作数量远不止使馆所估计的二百多件，至少千件以上。经研究，决定留下郁风清点和鉴别，吴作人继续前往瑞士完成访问任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郁风曾是潘玉良学生，面对老师在海外留下这么多的作品，心中充满对老师的敬意。但她认为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清点工作，希望使馆派人协助或请几位华侨来帮忙。不过使馆总共只有六个人，各司其职，根本抽不出人来，也不便请外人进入使馆帮忙。郁风只好要求留下代表团的翻译任树高来协助。而任树高这次随团出差来巴黎，本是单位领导的照顾。因为他爱人在巴黎学习，得病手术后需他来看护做饭。经过郁风的再三劝说，任树高勉为其难地抽出三个半天来帮郁风。他们两人艰难地一一打开画卷登记造册，初步选出一米以上较大幅的油画、彩墨画约150件，小幅带框的油画50件，无框的油画30件，旅法画家吕霞光从巴黎东方博物馆索回的31件，五六个大画夹里的线描、速写、版画80余件，另外还有潘玉良收藏的张大千、徐悲鸿、滑田友、常玉、黄君璧的作品8件。此外剩下各时期的作品估计还有一二千件，因为郁风的签证即将到期，实在来不及清点，只好作罢。

郁风回国后于6月9日在给文化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美协的报告里写道：“旅居巴黎的中国画家都认为潘玉良数十年在艺术上的刻苦追求是有成就的，遗作应由国家保存……”“据久居巴黎的中国画家说，潘玉良的作品如大量的付予画廊市场，是卖不了几个钱的，还不如全部运回国内，过去常玉之死就是很惨的经



郁风：《关于潘玉良遗作的整理和处理问题的报告》手迹

验，死后一大卷画只卖几百法郎……”“如果运回国内，还不能公开通过法国海关，因遗产税很大……要联系好国内的货轮，包装也要尽可能简单……”她建议由国内派懂行的人去拆除油画的内外框和彩墨画的玻璃框、裱褙木板，卷成数卷装箱。另外“使馆说没有经费，一个钱也不能出，装箱运输均须国内拨款……”云云。

吴作人在6月25日见到郁风报告后附注：他于6月4日去大使馆复看了郁风挑选的画，提出“与文化处（部）商洽，希望在最近的‘赴西欧展品’的押运人员，最好有两位能胜任的（有一位油画家）专程去巴黎领事（大使）馆，给最少两周时间，以完成拆卸油画及装箱任务。”

与此同时，驻法大使馆也于8月16日以（82）法领字887号文件向外交部领事司并文化部艺术一局，报告了与郁风的报告、吴作人的附注相同的内容，并提出潘玉良剩下的画“如作遗产处理，手续十分复杂，而且遗产税、公证费昂贵，这些作品能否卖出去也难以估计，因此我们认为不宜作为遗产处理。”还复印了潘忠玉1977年及1982年3月的来信，转述来信要求提出：“考虑到运回的作品较多，除从运回的作品选几幅给家属作纪念外，可否给潘玉良的家属一定报酬，请国内考虑。”

四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石楠写成小说《张玉良传》。1982年12月27日，安徽《清明》杂志编辑部在第四期发表《张玉良传》的同时，召开作品座谈会。鉴于小说是依据本省“真人真事”（当时大家都这么认为）所撰，所以省委根据省文联的汇报特别重视，省委常委副省长苏桦、宣传部副部长戴岳、省文联领导陈登科和省直部分著名作家、画家参加。也邀请作者石纯男和潘玉良的儿媳彭德秀到会。有意思的是，戴岳和在座的老画家王石城竟曾是潘玉良的学生，戴岳说：“开始我不知道张玉良是哪一个，（看了小说）后来才知道是我的老师潘玉良教授！”因此，在彭德秀、戴岳、王石城追忆潘玉良的一些往事和石纯男介绍创作经过（并未说明情节系虚构的情况）后，与会者都很兴奋，认为这部小说应该作为省的重点作品好好宣传。会上，省美协的周昭坎无意中透露中国美协外联部曾来电要求协助了解潘玉良家属成员的情况，好像是与潘玉良的遗产、遗作有关，要弄清潘家有多少个合法遗产继承人。这更引起大家兴趣，彭德秀也表示，如果遗产



潘赞化（后排左二）潘玉良（前排左一）
夫妇与朋友们合影（1920年代）



青年时代的潘玉良

中有画作，除留下几幅作纪念外，愿意全部送给政府处理。因此有人建议成立“纪念艺术家潘玉良委员会”来做《张玉良传》的宣传和筹建潘玉良美术馆的工作，争取把潘玉良的遗作弄到安徽来。

彭德秀也很机灵，回家后立即于1983年1月10日写信给中国美协，宣称：“我是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儿媳”，“最近在京一位朋友（注：此处应指安徽美协的周昭坎。周于1983年-1985年间断断续续被中国美协借调，来往于北京-合肥。1986年调中国美协。）告诉我，党和组织上的关心，曾派人前往巴黎整理潘玉良的作品，我全家便是万分感激。”表示她与潘玉良“近四十年的不间断的相互信件交往”，“组织上如有赐教，我等将义不容辞的做好要做的工作”云云，和中国美协套近乎。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艺术处副处长王庭也辗转打听到文化部美术处代处长王米在处理潘玉良遗作的事，即于1983年2月春节后打电话给王米，表示省委极为重视此事，潘玉良是安徽籍的画家，应当叶落归根，因此，希望安徽方面能够参与此事的处理，“上下通气，加强联系”。

3月上旬，文化部借王米应邀出席“安徽省城市雕塑规划会议”之便，指示他就潘玉良遗作处理问题向安徽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在合肥，王米与省美协主席鲍加、副秘书长蔡迪生、秘书周昭坎等交换了意见，又得到省委宣传部部长戴岳三次约见，并由省委安排到安庆会见了潘玉良家属。这次多方沟通的结果，由宣传处处长王庭起草《关于我省旅法画家潘玉良遗作运回国内和处理意见》，以省委宣传部公函于3月30日寄交文化部党组。《意见》归纳为七点：1.潘玉良作品全部运回国内收藏与研究；2.成立潘玉良遗作处理小组配合文化部工作；3.作品运回后在北京、合肥先后展出；4.出版《潘玉良画集选》；5.组织作家进一步撰写潘玉良事迹；6.家属明确表示全部遗作献给国家，中国美术馆选藏少量代表作，其余暂放省博物馆保管，待省美协建成美术馆后转美术馆收藏保管，选出几件送家属留作纪念；7.请文化部转请驻法使馆或新华社驻法记者代为进一步收集采访潘玉良史料和流散于欧洲的作品等。王米返京后也即于5月4日以艺术局名义向周巍峙部长并部党组书面报告《关于旅法画家潘玉良遗作运回国内的请示》，在报告与驻法使馆、中国美协、安徽三方面沟通的情况后提出：1.由驻法使馆将潘玉良全部作品按使馆“多余物资”装运，等便船运回，运回后在京首展，留少数几件代表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余移交安徽省处理，文化部不再参与具体安排；2.赶在雨季前由



潘玉良遗物中的奖状

文化部艺术局和安徽省委宣传部各派一名处级干部赴法负责处理此事，为期20天，经费由文化部承担。周部长阅后指示：“先送美协，主要是华君武同志提出意见（注：华不久前刚从艺术局局长调美协驻会常务副主席），再将有关材料一并提交部办公会上讨论。”华君武阅后正好碰到文化部办公厅李刚，就当面表示意见：5月17日正好有两位画家要去巴黎，怎么弄他们是内行，就让他们办吧，不必另外派“处长”去。于是，一面立即交代任务给准备启程去巴黎的侯一民、汤小铭，另一方面文化部办公会讨论形成《安徽旅法画家潘玉良遗作运回国内及处理意见》（文艺字（83）第1235号文件）。意见要点有三：1.“我部同意将现存放在驻法使馆的潘玉良遗作全部运回国内。运回所需经费由我部负担。”2.“运回潘画的工作，决定就中央美术学院侯逸民（注：即侯一民）和广东画院汤小铭同志5月17日访法之便，在巴黎延留20天，处理潘画运送回国的包装等准备事宜。俟有便船托运回国。”3.“潘画运回后由文化部艺术局收件，除中国美术馆留几件代表作作为国家收藏外，其余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传部接收。建议省委考虑满足其家属留几张作为家庭纪念的要求。”4.“关于省委宣传部对潘玉良的纪念、研究、宣传等事项的设想，由省委安排决定。”至此，潘玉良遗作运回的事有了明确的落实，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由政府出面对一位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作品运回国内作出决定，这一决定在国内和国外华人美术界引起关注。张仃等美术家虽然曾对《画魂》夸大潘玉良的成就表示不满，但对政府运回潘玉良的全部遗作仍然表示支持，认为是对流落海外的华人画家的关怀；吕霞光等海外画家更对政府这一决定倍加赞扬，因此就有了后来七位海外画家又为潘玉良找回90幅遗作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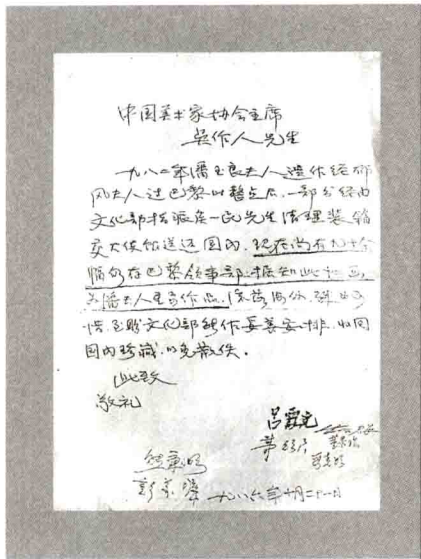
五

再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的侯一民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汤小铭于1983年5月17日到巴黎参加完外事活动后，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在闷热的使馆地下室拆画框、分类登记、打包装箱，弄得灰头土脸，一身臭汗，真够难为他们的了。好不容易才把所有的东西装进六只铁皮箱子和一只木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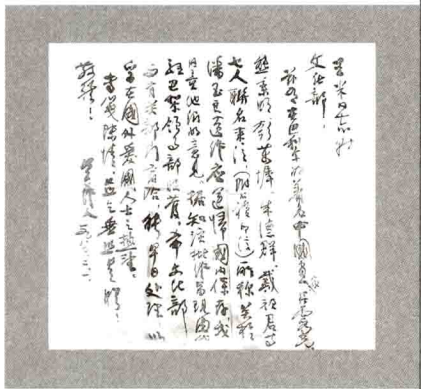
1984年1月9日，大使馆委托停靠在法国马赛港的上海远洋公司“铜川”号，将潘玉良的7大箱遗作遗物装船回国。使馆1月16日致文化部艺术局函称：“遗作遗物共七箱（其中一个木箱，六个铁箱）”，“铜川号将于2月10日左右抵上海港”，船长、政委一再要求“轮船抵港后，务必及时办理提取手续”否则“概不



潘玉良遗物中的旗袍



旅法华裔美术家吕霞光等致吴作人函



吴作人致王米函

负责”。“随函附上文化部侯一民、汤小铭同志整理的潘玉良遗作遗物清单影印件、潘忠玉1982年11月29日给我部负责同志信的影印件及‘铜川’轮船长钟云吉同志签收字据。”潘忠玉的信除催促外交部尽快处理潘玉良遗作遗物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他外，重申“国家如果需要点，我们可以捐献些给国家，为国做些贡献，另，是否可以在作品中挑选几幅，带回国内给我们后人作为永远的纪念。”口气较前“全部送给国家”略有不同，也许这就已经埋伏了作为继承人后来要求安徽省博物馆返回潘玉良遗作的官司。

1984年2月7日，早春二月一个江南雪飞冰冻的日子，中国美协安徽分会派出干部顾美琴、杜安安到上海，迎接将于2月10日刚从法国抵达上海的“铜川”号远洋轮，铜川号停靠在离外滩四五十里的13号浮筒处，船无法靠岸。顾美琴与杜安安约了上海美协两位同志帮忙，冒着大雪严寒，找了一只小船，划到江中靠近铜川号，与船长钟云吉办妥交接手续，然后把箱子搬到小船上，再把小船划到岸边，把七个大箱子弄到岸上。但在过海关时还是遇到了麻烦，尽管船长钟云吉拿着大使馆的信一再说明，海关方面坚持要打开箱子一一检查。王庭与蔡迪生闻讯于13日持文化部和省委介绍信赶往上海，磨了不少嘴皮，说了不少好话这才于18日勉强放行。然后，由顾、杜两位冒雪悄悄地将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两千多件遗作遗物用卡车于2月24日运回合肥，存放于安徽省博物馆。1984年3月14日至16日，文化部美术处代处长王米、副处长刘国华，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李寸松，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厚宏、艺术处副处长王庭，安徽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欧阳林，安徽美协副主席、秘书长鲍加、副秘书长蔡迪生、秘书周昭坎、顾美琴，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邓朝源、保管部主任马彬、陈列部主任董伯星和潘玉良家属彭德秀、徐永昇（潘晓忠之夫，安庆一中教师）组成清点小组，在省博物馆开箱清点运回的作品和物品。七个箱子里，除了生活物品、画具外，运回的作品是潘玉良1937年以后创作的作品，包括262幅油画、130幅彩墨画、164幅版画、23幅水彩画、四件雕塑，1589幅素描和速写，还有两包速写，因篇幅较小很难计数，当时概算总共两千余件（据1992年8月11日安徽省博物馆发表的《潘玉良四千余遗作回归故里八年来的回顾》一文称：“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共计4719件……”）。清点后签署了协议，确定家属自藏73幅作品，中国美术馆收藏28件和常玉作品一件，中央美术学院收藏25件。其余均暂时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待安徽美协建成美术馆后移交安徽美协所有。3月18日，在

安徽省博物馆举行了简单的“潘玉良遗作清点展示”，省委书记黄璜、副书记袁振、杨海波，省长王郁昭、副省长苏桦、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厚宏、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省文化厅副厅长刘云龙等参观了展示。

1985年7月5日，安徽省美协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博物馆举办了“潘玉良遗作展览”，在画展的开幕式上，新任省委宣传部长牛晓梅向彭德秀颁发了奖状及5000元奖金。媒体公开报道后，“‘画魂’归来兮”一时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

不过，此后由于潘玉良作品的归属与保管问题，纠纷频发。

首先是省博物馆馆长邓朝源于1985年11月提出：“……关于潘玉良遗作的归属问题，希望宣传部尽快作出决定，不然的话对这批艺术遗产的保护很不利。现在遗作暂存博物馆，箱子长期由美协锁着，里面的东西有无霉变和虫蛀等情况不得而知，……这样下去实在危险。”而在明确省博物馆负责潘玉良遗作后，由于上海美术馆于1992年7月为办“潘玉良逝世15周年画展”来借作品展出发生的“借展费”的谈判，引出了7月26日《新民晚报》发表的《六千作品归故里，七年入库无人问》一文的发表，关于“潘玉良遗作保管不善”的报道，激起一场保管问责风波，一方面促使省政府拨出20万元特别经费，用于改善潘玉良遗作保管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引发潘玉良家属彭德秀、潘晓忠、潘忠丘、潘忠共、潘忠玉五人借此题于1994年6月28日向安徽省最高人民法院起诉安徽省博物馆，诉请“返还潘玉良遗产”。1998年8月3日省高院宣判家属败诉。在家属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高院又于2000年6月19日判决“维持原判”，前后历时6年。期间，1995年还因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来借展作品发生“权利费”争执与出卖潘玉良作品的传言风波，也曾闹得沸沸扬扬。

光阴如梭，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不管怎样，“画魂”归来，叶落归根，总是一件好事，一段佳话。尘归尘，土归土，也该让潘玉良安息了。后人们该做的是让潘玉良留下的人生精神财富发扬光大，让她的美术作品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艺术享受。

2011年1月14日于京郊立水桥畔



20世纪20年代潘玉良像



在上海美专任教时的潘玉良（20世纪30年代）

“画魂”归来的前前后后

——关于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是与非

20年前同样一个寒冷的早春二月，也是一个江南雪飞冰冻的日子，中国美协安徽分会派出干部顾美琴、杜安安到上海，迎接2月10日刚从巴黎抵达上海的“铜川”号远洋轮，与船长钟云吉办妥交接手续后，悄悄地把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七大箱两千多件遗作遗物从陆路运回合肥。次年，当消息传开时，“‘画魂’归来兮”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

20年过去，关于潘玉良的是非之争似乎一直没有停歇过。最近又一部电视连续剧《潘玉良》开播，据说曾因片内裸露镜头过多而推迟了播出时间。看来，一些人还是把潘玉良那一段“青楼”生涯作为“卖点”说事，而把真正艺术性情中的潘玉良掩埋。

1984年春，我有幸先睹刚从巴黎运抵合肥的潘玉良遗作开箱清点。此前，我参加了安徽《清明》文学季刊编辑部召开的关于传记体小说《张玉良传》的研讨会，会见了作者石纯男(石楠)、潘玉良的家属和她的学生戴岳、王石城等，了解了潘玉良其人其事的一些背景材料。据此，我于1986年第13期中国美协《中国美术》撰文《一位值得尊敬的女画家》，介绍了潘玉良的生平和艺术，使人们重新记起几乎为人遗忘的前辈油画家潘玉良的艺术和人生，并引起海外一些潘玉良研究者的兴趣，陆续设法和我联系，交换了所知所见，由此，我认识中的潘玉良的形象日趋丰满。

可是，学术界严肃认真的探讨，如何敌得过小说、影视、报刊等传媒关于潘玉良传奇式经历的热“炒”？！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传闻早就淹没了这位女画家为艺术而执著追求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模糊了她在艺术上的真实成就和恰当的历史地位。